

以色列内阁就发布声明称，在 Hamas 发动对以色列的大规模袭击后，“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将成为对 Hamas “前所未有的巨大奖赏”，并将阻碍未来任何和平协议的达成。但其实正因为巴勒斯坦还没有真正建国，其内部比较激进的派系才没有太多掣肘，整个国家也没有统一的管理规范。如果巴勒斯坦实现前述三个前提成功建国，就意味着其实现了内部政治统一，这就要求其政府必须对内实行有效管理，有效约束各派别武装。这对以色列有好处，然而大部分以色列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落实“两国方案”对巴勒斯坦而言压力可能更大一些。因为这要求其管理好本国几百万人口的民生问题，还得遵守国际法、约束宗教极端分子等。

阿犹和解趋势在向前涌动

世界知识：您认为未来中东地区格局走向将会如何？

殷罡：如果未来巴勒斯坦能成功建国，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整体关系也将迎来极大缓解，这是最理想化的前景。近些年，整个中东地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和解趋势一直在向前涌动，任何国家如果不顾一切地去阻挡这个浪潮，恐怕都会得不偿失。

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曾多次表示，本轮加沙战事结束后将恢复与以色列的和解谈判。沙特不会让巴以冲突耽误自己的国策。不过，外交接触、建立外交关系与建立全面外交关系是有区别的。建立外交关系意味着两国可以互设代表处；建立全面外交关系是指两国互设大使馆、领事馆、互派大使等。沙特可能会与以色列分阶段、分步骤推进双边关系发展。其实，在此次 Hamas 突袭以色列前，沙特与以色列举行的只是建交谈判，没有马上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意图，因为巴勒斯坦问题还没有明确说法。长期以来，沙特一直坚持着两条

原则：一是赞助支持巴解组织；二是坚持“在巴勒斯坦建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全体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然而，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都已“违背原则”与以色列在 2020 年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随后与以色列展开谈判就没有什么障碍了。

不过，中东地区最持久的矛盾不在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而是在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之间。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近些年出现的地区“和解潮”，在被本轮加沙冲突“打断”后，会在冲突结束后随着加沙建立新秩序而逐渐恢复。2023 年 3~4 月在中国斡旋下复交的沙特与伊朗，也会继续推进与彼此的和解进程。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国家，若真想帮助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建立新秩序，也离不开与以色列合作。此外，在未来，“两国方案”完全有可能被落实，但关键在于各相关国家及非国家势力是否真正有诚心愿意这样做。📖

加沙冲突外溢：多点联动但主线清晰

文 / 唐志超

本轮巴以冲突虽以加沙地带作为主战场，但其在爆发后迅速产生的外溢在整个中东地区呈现“多点开花”的景象，甚至在距离中东遥远的美国、英国、乌克兰、巴西、南非等地也可

感受到强烈的冲击余波。除显性的地区武装冲突不断扩大蔓延外，此次加沙战事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引发的隐性冲突也在深刻影响着地缘政治和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

地区外溢： “多点开花”与阵营对抗

2023 年 10 月 7 日，在 Hamas 突然向以色列发动“阿克萨洪水”袭击后，以色列国防军发

起针对加沙地带武装组织的军事行动“铁剑”，此后加沙战事很快就开始向“中心—外围”的冲突模式发展。以加沙地带为中心战场，中东地区同时出现了五条“战线”：即约旦河西岸、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红海。这五条战线本质上属于外围战，旨在策应哈马斯，分散以色列的精力和资源。

在约旦河西岸方向主要是以色列

军警、犹太人定居点极端分子与巴勒斯坦各武装组织派别、巴勒斯坦民众之间的流血冲突。由于加沙冲突规模大、烈度高，导致约旦河西岸的冲突不太为外人关注。实际上，近年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的冲突规模与频率也在不断上升，此次加沙战事导致该地的对抗进一步升级，外界普遍担心西岸的局势也将失控。据巴勒斯坦卫生部统计，截至2024年3月，本轮冲突导致至少427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遇难。

在黎巴嫩方向主要是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该战线冲突主要集中在以色列北部的黎以边境地带，但黎巴嫩首



2024年3月10日，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发表视频讲话，称该组织在红海的袭击行动将在斋月期间升级。

都贝鲁特及以色列南部城市偶尔也会成为被袭击目标。由于真主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体，不仅人数众多，还拥有强劲的军事实力，其中包括数量庞大的弹道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等，实力远超哈马斯。因此，外界普遍担心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会爆发大规模战争。本轮加沙冲突爆发后，为阻止真主党参战，以色列被迫在北部投入重兵，避免开辟第二战场；美国还专门派遣航母战斗群驻扎东地中海。黎巴嫩战线是除加沙地带之外冲突最激烈的区域，黎以边境地区几乎每日都发生炮击事件。据统计，自2023年10月8日至今，该战线冲突已造成黎方

200多人死亡，900多人受伤，近十万居民流离失所；以方则有十数人死亡，近六万居民被迫从北部撤离。

在也门—红海方向则主要是也门胡塞武装与美英之间的激烈对抗。这一战线的显著特点是美英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代以色列出面军事打击胡塞武装。本轮加沙冲突爆发之初，胡塞武装主要针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实施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打击，但由于双方相距较远，这些袭击未能取得明显效果。自2023年11月中旬开始，胡塞武装转而攻击在红海航行的“与以色列相关”船只，并由此引发红海危机。对此，2023年12月，美国发起“繁荣卫士”护航

行动，但响应者寥寥。2024年1月12日，美英又开始联手对胡塞武装展开空袭，不过迄今仍未能阻止胡塞武装的行动。据统计，自本轮加沙冲突爆发以来，胡塞武装对途径红海船只发动袭击超过60次。为躲避袭击，数百艘过往商船被迫绕道非洲好望角前往欧洲和地中海。红海危机不仅引发全球海上航运危机，危及全球供应链安全，还升级为红海安全危机。胡塞武装称，只有以色列停火，它才会停止袭击。这条战线虽未给以色列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但却给美国造成了不小的军事和政治压力。在加沙，美国通过援助物资间接卷入战事；而在也门，美国则通过军事行动直接卷入冲突。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冲突，则主要是被认为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武装对美军驻伊拉克、叙利亚军事基地频繁发动袭击，与美以的回击。截至2024年2月，伊拉克民兵武装为报复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袭击伊叙境内美军基地超150次，美国则回以一系列空袭报复。这些袭击大多属于袭扰性质，虽未给美军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但依然对其构成不小压力。此外，美国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的回击还进一步激化了伊拉克国内矛盾与反美情绪，从总理、国民议会代理议长到各民兵武装组织等各方，强烈要求美军撤离本国领土。与其他战线相较，发生在伊拉克和

叙利亚的冲突烈度较低，各方均保持了克制，以免事态扩大。

总体来看，这五条战线的地理分布虽较为分散，但具有三个明显的共同点。一是阵营性对抗。这些冲突虽多点发生，但主线清晰，主要呈现为美国—以色列与被认为由伊朗领导的地区“抵抗阵营”之间的对抗；二是非国家行为体属性。截至目前，与以色列、美国发生冲突的主要是地区非政府武装组织，没有主权国家直接参与其中；三是具有联动性。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也门发生的冲突与加沙战事关联紧密，呈现多点联动、相互呼应的态势。

然而事实上，本轮加沙冲突的地区外溢并不局限于上述五条战线。除显性的武装冲突外，还有隐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层面外溢。政治上，加沙战事推动中东地区主要矛盾转换，地缘政治关系急剧生变，近些年出现的地区“缓和潮”受阻；经济上，加沙战事使以色列、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等国经济遭受重创。例如，冲突使黎巴嫩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了一个百分点；受红海危机影响，埃及苏伊士运河收入自2024年1月至今减少了50%，2024年1月该运河船只通过数量减少30%。

全球外溢：国际秩序之变

本轮加沙冲突的外溢还蔓延

到了中东以外的地区。首先，冲突对以色列和美国的全球声誉产生“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给当地造成巨大人道主义灾难，截至2024年3月19日，加沙战事已造成巴勒斯坦超3.17万人死亡，7.37万人受伤。这加剧了以色列在国际上的孤立，全球反以、排犹主义再次泛起。而美国一方面不断向以色列输送武器弹药、给加沙冲突火上浇油，另一方面又希望冲突尽快停止、避免战事蔓延扩大的矛盾政策，也让其所谓维护“人权”“民主”的虚伪面具被彻底撕下，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被彻底暴露。

此次加沙战事还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中东政策造成巨大冲击。突如其来的战事严重干扰了拜登政府集中精力开展大国竞争的战略盘算，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印太”地区、东欧是其战略优先区域，中东则属于重要区域，但加沙冲突使美国不得不将政治、外交、军事等各类资源紧急投向中东。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缓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和推动地区一体化的两大政策目标均已失败，其企图重塑中东秩序，推动中东国家偏离“中国轨道”的战略图谋也难以继。值得一提的是，外界普遍认为，本轮加沙冲突很可能使拜登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遭遇“滑铁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和纵容，使

阿拉伯—穆斯林裔选民、青年一代和民主党左翼对拜登政府极其不满。

其次，本轮冲突还外溢至欧洲，直接影响着自2022年2月以来持续至今的乌克兰危机走向。此次加沙冲突的忽然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美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危机的关注，还限制了其对乌克兰的资金与武器支持。例如，加沙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一度中断，美国国会援助以色列的热情也远高于乌克兰，令后者十分担心俄罗斯正成为加沙战事的受益者。

最后，此次冲突也在国际社会层面造成巨大地缘政治分歧，引发了有关国际正义、人道主义、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激烈讨论与较量。在联合国及其他多边场合，围绕加沙冲突，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全球南方”国家与美国—以色列展开了激烈斗争。以色列拒不履行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美国持续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中投反对票，招致伊斯兰世界和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强烈谴责批评。2023年11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

会、同年12月南非在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种族灭绝”，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大会集体声讨以色列等事件，不仅显示出“全球南方”国家对和平正义的强烈诉求，还凸显了国际权力结构变化。

冲突不息，外溢不止？

巴以问题不仅是中东地区一系列错综复杂问题的核心，也是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本轮加沙冲突的持续外溢有其逻辑性。从根本上看，巴勒斯坦事业所具有的正义性，是巴以冲突必然引发连锁反应的底层逻辑。巴勒斯坦民族权益长期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独立建国的夙愿也长期无法实现，是巴以冲突频

繁爆发的根本原因。从表层看，本轮加沙冲突的不断外溢，也与当前国际和地区的复杂矛盾有着紧密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美国的政策在三方面决定了巴以问题因其难解。一是美国以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为核心利益，长期偏袒以色列。二是美国将巴以问题与维护其中东霸权相联系，为巴以冲突引入了更多外部矛盾。自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一边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在“亚伯拉罕进程”下实现关系正常化，一边却加速构建地区“反伊朗联盟”。这一政策具有内在冲突，必然招致伊朗及其盟友的反制。三是美国根据其全球战略考量，在过去十年中持续从中东战略收缩，不愿推动巴以和平，导致巴以问题



供图/IC photo

2024年1月26日，联合国国际法院在南非提起诉讼后发布初步判决和紧急命令，要求以色列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在加沙地带出现种族灭绝行为。

日益边缘化。

短期看，只要加沙战事不结束，本轮冲突的外溢就不会停止，甚至还可能继续扩大蔓延。一旦加沙战事迎来停火，以色列的下一步动向就值得密切观察，

其是否会对真主党开战、是否会与伊朗爆发直接军事冲突最为引人注目。长远看，巴以冲突的联动性、外溢性能否得到彻底解决，与国际正义能否得到声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能否建立紧

密相关，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本质上是国际正义维护与国际秩序合法性问题。^[7]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美西方国家立场分歧为何不断加深

文 / 余国庆 刘姝含

本轮加沙冲突爆发至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态度变化显著。其间，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加沙问题上的分歧也不断暴露，尤其是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刻意和美国保持距离。与此同时，美西方国家内部也因加沙冲突产生尖锐对抗，一些政界人士对以色列的批评明显增多，民众不时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表达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支持和同情，抗议本国政府对加沙人道主义灾难的漠视。这些现象反映出巴以问题作为一个顽疾，正在成为威胁中东地区稳定和全球安全的重要因素，美西方国家不仅需要反思自身过去所作所为，更需要重新审视巴以问题对地区、世界甚至对其国内政治的影响。

背负历史责任的西方国家应更有效推动停火

此次加沙冲突的爆发，从表面上看是 Hamas 突袭以色列引起

的，但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巴勒斯坦问题的产生和本轮加沙冲突的延宕，与西方国家历史上的殖民政策及其在中东地区谋取私利的意图难脱干系。

西方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2024年3月8日，一名巴勒斯坦支持者在英国剑桥大学对英国前外交大臣贝尔福的画像喷漆，并用锋利物体将其划坏。众所周知，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公开发表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的言论，导致阿犹矛盾产生，这也是当代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取得了对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权”，并通过鼓励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来维持本国对巴勒斯坦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但这一政策难以维系。巴勒斯坦问题失控后，英国不得不在1947年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至当时由美国控制的联合国讨论。最终，联合国大会在1947年11月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即联合国第181号决议）。不难看出，英国推动的巴勒斯坦“分治”，是其在历史上一贯推行的“分而治之”殖民政策在中东地区的典型之作。“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在当时极大地忽略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此后巴勒斯坦各派别以各种形式发起的反抗，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抗议这一“历史不公”的因素。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西方国家因背负历史和道义责任，在推动本轮加沙冲突尽早停火上更需付出有效行动。

从立场“一边倒”到美国“特立独行”

本次加沙冲突爆发初期，美西方国家大多被情绪主导了立场。Hamas 突袭以色列后，短短两天内以色列包括军人与平民在内上千人惨死的影像信息便在网上传播，极大冲击了美西方国家政府、媒体和公众的情感，这些国家各界几乎都对以色列遭受的攻击表示震惊和同情。包括